

五代两宋荆湖地区商业城镇发展及其格局演变^{*}

袁钰莹

内容提要:五代两宋是荆湖地区商业起步和商业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五代特殊的政治格局给荆湖地区带来了发展商业的外部动力与条件,凭借与北方的茶叶贸易、作为南北往来主要内陆通道的区位优势 and 统治者的推动政策,长沙与江陵两城的商业有了大幅进步。宋代随地区农业生产力持续提高和经济开发不断深化,荆湖与中原、江淮以及川蜀先后形成了较为密切的贸易联系。从五代到北宋再到南宋,该地区主要对外贸易方向从北向转为东—北向,而后又转为东—西向。长沙始终是湘江流域的商业中心,鄂州则在南宋取代江陵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枢纽。区域商业城镇以长江和湘江为轴,从散点状分布逐渐发展为东北密、西南疏的初级网络格局。这一演变过程体现出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局势变动与区域商业发展的互动与呼应。

关键词:五代 宋代 荆湖地区 商业城镇 空间格局

两宋商业和城镇市场的突破性进步已是学界共识。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步,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江南在全国各区域中整体发育程度最高,历来是学界聚焦和研究最多的地区。^①相比之下,荆湖地区^②虽然同在长江以南,也被划入以两浙为核心的东南大区域市场,^③却因为经济开发相对迟缓、特征不突出、发展水平偏低而较少受到关注。^④从历史横截面观察,这个区域似乎确实缺乏亮点。但如

[作者简介] 袁钰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北京,100084。

* 本文为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项目编号:2020SM05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整体性的研究,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王涛:《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与繁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张剑光:《传承中求变化:唐五代江南县城的空间规模和结构》,《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具体个案的研究不胜枚举,此处不再一一列出。

② 本文中的“荆湖地区”指宋代荆湖路包含的区域,主要由两湖平原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组成,大约是今天湖北省东南部和湖南省的范围。

③ 漆侠将全国划为几大区域市场,其中东南市场包括两浙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和福建路。广南东、西路从属于这一市场。漆侠:《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8—943页。

④ 对于荆湖地区商业的研究多集中于两湖平原完全形成、农业开发较成熟的明中叶以后。杨果等曾对宋代两湖平原自然地理、政区、人口、交通、经济、城镇等方面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参见杨果:《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及其地理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杨果:《宋代荆江堤防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果、陈曦:《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3期;杨果、陈曦:《宋元时期江汉平原自然灾害探析:种类、分布、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整体而言,关于五代和两宋时期荆湖地区城镇商业的专题研究仍较少,多是在江南经济、商业研究中作为附属出现,或在五代割据政权统治,宋朝开边西南、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等研究中被简略提及。参见曾国富:《五代南平史三题》,《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庄华峰:《五代时期东南诸国的政策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张衢:《试论两宋时期湘西沅水流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求索》2006年第7期;杜文玉:《五代十国经济史》,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安北江:《宋初战略地缘政治研究——以平定荆湖为中心》,《理论月刊》2018年第11期。

果顺纵切面审视其发展进程,则会看到在五代分裂的不稳定局势下,荆湖割据者迫于形势对贸易的倚重反而成为地区商业起步的关键契机。从北宋到南宋,尽管该区域因距离战争前线较远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节奏,但其商业城镇^①的发育和空间格局的变化,同样映射出国家政局和经济趋势变动对区域的影响。荆湖地区五代以前经济积累薄弱,但因两湖平原和长江、湘江两条跨区水路,以及江南的经济辐射,使其在农业生产和跨区域贸易方面颇具潜力。来自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有一定力度,却不至于完全主导当地经济。这种特点使荆湖地区在五代两宋更迭过程中的商业城镇发展及其空间格局始终与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有着密切联系。目前,学界从这一层面进行的考察还不充分。鉴于此,本文追索五代、北宋与南宋三个时期荆湖地区的商业进程和主要推动因素,分析主要商业城镇及其空间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探讨各时期的特点和差异,以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政治、经济局势与荆湖地区的互动。

一、五代楚和荆南商业发展的内外部动力

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地区间物资的流动互补主要通过政权控制下的调拨实现。^②唐末五代的割据格局不仅破坏了这种调配机制的运行,放大了地区间的自然资源和物产差异,也改变了各地的政治、军事、交通地位。南方农业生产力和商品交换的普遍进步,南北物产的互补性和特殊政治格局给荆湖地区提供了商业发展的外部机会,而割据于此的楚和荆南^③基于物产条件及交通区位采取的经济政策则从内部刺激了本地商业。

楚和荆南作为割据政权,粮食自给是自立的基础,充足且稳定的财政收入则是维持军备水平、应对频发的战争、实现长期独立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战乱基本平复后,统治者都首先着力恢复发展农桑,安抚流民。^④在南方众割据势力中,荆湖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不及江淮和成都平原,也不像闽粤具有天然的海产资源和海外贸易优势,还存在本地不产盐和马的缺陷,对其他地区存在刚性经济依赖。仅靠耕作纺织并不足以解决上述物资需求或支撑其通过攻占其他地区来补充资源,因此,二者势必要诉诸于农业以外的途径。在当时政治地理格局四分五裂,而南方经济普遍发展,地区间贸易动力增强^⑤的背景下,荆湖位于各势力中间地带的区位条件及其与北方的物产互补性使楚和荆南不约而同转向商业。

中原政权对茶叶的消费需求为南楚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唐代北方地区饮茶之风已盛,参考《茶经》和《新唐书·地理志》各地土贡,江淮地区是其主要供茶地,荆湖地区仅见峡、归、鄂、衡、荆五州产茶,且品质上乘者少。^⑥五代时期,割据淮南和江东、江西地区的南吴及南唐政权与中原政权冲突频发,经常断绝经济往来,南吴攻下虔州后又隔断了“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贡”的两

① 本文所讨论的“商业城镇”,指作为一定区域内商品流通中心,或因贸易兴起、以商业为核心功能的城市和市镇。这些城镇具有区域商品集散和商业枢纽的功能,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其发育情况和空间格局能投射出区域商业情况。

②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11—19世纪的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楚也称南楚、马楚,以长沙为政治中心,控制区以洞庭湖平原为核心,东界江西,西界川蜀,南至五岭以北。荆南也称南平,以洞庭湖北的江陵府为根基,后又占领归、峡二州。

④ 《资治通鉴》卷274同光三年(925)闰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953页)记载:“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907)五月条(第8680页)记:“荆南旧统八州,乾符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残毁,户口雕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复业。”《宋史》卷173《食货上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83页)记载:“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蓄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

⑤ 郑学檬和杜文玉均论证了五代南方的政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虽然经济和商业发展时有波动或停滞,但整体上是有所进步的。参见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225—260页;杜文玉:《五代十国经济史》,第132—169、288—295页。

⑥ 陆羽著,于良子注释:《茶经》卷下《八之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0页;《新唐书》卷40《地理四·山南道》、卷41《地理五·江南道》,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27—1039、1056—1075页。

浙、福建地区北上的内陆通道，^①中原和浙、闽、粤往来只能取海道，或从荆湖穿行，“出荆、襄、潭、桂入岭，自番禺泛海至闽中，达于杭、越。”^②海运风险高，内陆迂途绕远则运输成本高，均不适于大量货物从江浙到黄河流域的跨区域贩运，因此，中原失去了旧日的主要茶叶供应地。^③这给与中原友好且具备各种茶条件的楚提供了外部机会，而楚地发展农业带来的粮产提高和避战迁入人口带来的劳动力增加，从内部为扩大山区开发和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提供了支撑。意识到这一契机的南楚统治者开始“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④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这种供需关系进行充分利用。一方面，官府垄断长途贸易，对“民间采茶，并抑而买之”，^⑤再由官兵贩运北上以贡奉中原政权或在北方贩卖，补足了财政所需。后梁允许南楚“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⑥湖南纳官李震曾在北方发生叛乱时，救下王镠次子并利用茶褚将其带回湖南，^⑦可见其贩茶范围已到达中原政权的北部边界地区。另一方面，南楚对本地茶叶销售的管控相对宽松，“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贍军”，利用贸易额的增加来提高税收，^⑧弥补了政府贩运力的有限和销售市场的空白部分，通过官贩和民售并行，从茶叶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⑨

为了从商业活动中获得更大收益，南楚还充分利用了特殊交通格局带来的区位优势。上文提到南吴和南唐政权阻断了浙、闽两地北上的内陆通道，导致赣江与大运河沟通南北的功能几乎失效，尚可通行的湘江一线跃升为南北往来最主要的内陆通道。交通路线的约束使南北方之间的贸易多经由湘江进行。南楚“不征商旅”^⑩的税收政策，以及铸发在其他地区难以使用的铅铁锡钱以促进本地物产外销的货币政策，^⑪又构建了一个放大这种动力的政策环境，使当地“四方商旅辐凑”，^⑫“凡天下商贾所贖宝货入其境者，只以土产铅铁博易之无余，遂至一方富盛，穷极奢侈，贡奉朝廷不过茶数万斤而已。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⑬通过与中原的茶叶贸易、货币和征税政策，南楚统治者实现了财富的快速积累，作为副产品，当地茶叶的种植和商品化进程加速，区域商业取得了整体性进步。

荆南的情况与楚类似，但受限于土地面积和物产总量，其外销物资有限，更多是依靠江陵府居江汉上游而“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⑭四方往来人货大都由此通过的区位优势。荆南物产有限，主要通过抢夺过境的上贡钱物而积聚财富。^⑮同时，也必须依靠与外地商旅尤其是北

① 《资治通鉴》卷 269，贞明二年（916）五月，第 8803 页；《资治通鉴》卷 270，贞明四年十一月，第 8836 页。

② 《旧五代史》卷 20《梁书二十·司马邺传》，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311 页。

③ 虽然少数民间商人仍从淮南贩茶入中原，如《旧五代史》卷 107《汉书九·史宏肇传》（第 1635 页）所载：“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贩为业，尝以十四万市得玉枕一，遣家僮及商人李进卖于淮南，易茗而回。”吴、吴越、闽等政权也不时向中原贡茶（参见《旧五代史》卷 35《唐书十一·明宗纪第一》、卷 38《唐书十四·明宗纪第四》，第 562、598 页；《册府元龟》卷 169《帝王部·纳贡献》，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第 2032—2045 页），但整体数量相对有限，稳定性和持续性无法保证。

④ 《新五代史》卷 66《楚世家第六·马殷》，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928 页。

⑤ 《旧五代史》卷 133《马殷传》，第 2046 页。

⑥ 《资治通鉴》卷 266，开平二年七月，第 8702 页。

⑦ 《旧五代史》卷 54《唐书三十·王镠传》，第 845 页。

⑧ 《资治通鉴》卷 266，开平二年六月，第 8702 页。

⑨ 《新五代史》卷 66《楚世家第六·马殷》（第 928 页）：“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

⑩ 《资治通鉴》卷 274，同光三年闰月，第 8953 页。由前文提及政府通过向本地百姓与北方商客的茶叶贸易征税获利推断，其并非对所有外地商旅的一切活动都不征税，这种税也可能主要向本地卖方征收。但无论向卖方还是买方征收，交易双方肯定都会通过改变交易价格或私下协商等方式，在实际上共同分担这部分税费。不过与其他征税较重的地区相比，楚的政策仍然具有吸引力。

⑪ 宫崎市定「五代宋初の通貨研究」『宮崎市定全集』第 9 卷 岩波書店，1992 年，58—61 頁。

⑫ 《资治通鉴》卷 274，同光三年闰月，第 8953 页。

⑬ 《旧五代史》卷 133《马殷传》，第 2046 页。

⑭ 颜真卿：《谢荆南节度使表》，《全唐文》卷 336，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405 页。

⑮ “自吴称帝，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岁时贡奉，皆假道荆南。季兴、从海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新五代史》卷 69《南平世家第九·高季兴》，第 973 页。“自武信王季兴时，诸道人贡过其境者，多掠夺其货币。”《资治通鉴》卷 287，天福十二年（947）八月，第 9375 页。

方商人的贸易来维持政权。荆南统治者高从海曾因占取襄、郢二州未果而“绝汉，附于唐、蜀”，但不到一年就因“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不得不上表谢罪，以求恢复往来。^① 对于因政府严格控制，普通贸易难以获得的盐、马等物资，荆南主要通过向周临政权称臣上贡，由他国赐予获得。^② 这些政权乐得以荆南为军事缓冲带，^③借此与其他地区间接互通有无，荆南也能由此始终保证一定的过境人货数量和物资获取。后梁时，荆南“衣食皆给于梁”，后唐明宗“岁给以盐万三千石，后不复给”，直至后周世宗占领江北，才又从泰州运盐给荆南。^④ 高从海统治荆南后，“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闽、吴、蜀皆称帝，从海利其赐予，所向称臣。”^⑤江淮、两浙、闽粤和川蜀均产盐，有理由推测，在中原不提供盐的时期内，其主要是从其他割据政权获得盐。纳贡获赐虽然是一种政治活动，但于荆南而言，也带有“以有易无”的商业色彩。

史料中关于五代荆湖地区具体商业城镇情况的记载非常有限，但是根据楚和荆南商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和动力，可对当时的商业城镇格局做一大致推断。湘江和江陵作为南北往来的主要内陆通道与枢纽，以及楚与中原的茶叶贸易是其商业发展的主因，因此，区域商业中心城镇应当是茶叶生产和商品流通具有优势的地方。长沙和江陵之所以成为割据统治的中心，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比统治区内其他州县更优越，能更好地实现对统治阶层的消费供给、政令信息的上传下达以及物资集散。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众多官员、军人等非生产者大量消费产生的贸易活动无需赘言。为了维持政权稳固，满足各项军政支出和生活消费，统治者势必会有偏向性地将人员、物资、财产集中于此，如“蛮素闻长沙帑藏之富”。^⑥ 楚和荆南商业发展背后浓重的政治意图和统治者对商业利润的重视，导致大宗商品和高价值货物交易也多限制在长沙和江陵城中进行，比如中原政权遣官至楚买茶会到长沙而非其他城市，^⑦周世宗年少时曾随大商人“往江陵贩卖茶货”。^⑧ 楚和荆南最主要的贸易对象是中原，同时也承担着广南、福建、两浙与北方商品交换通道的角色，其跨区域商业活动主要呈南北向展开，所以长沙和江陵既是割据区内的绝对商业中心，也发挥着长江以南和以北地区间商品交换枢纽的作用。荆湖其他地区中，朗州虽然军事区位重要，武陵在五代晚期甚至一度取代长沙成为湖南割据中心，^⑨但其与南北往来的交通条件不及湘水沿岸的长沙，邻接的西南溪峒地区无论物产数量还是对外商品往来都较为有限。位于边界地带的岳、郴、道、归等州，因荆南、楚、南汉、南吴、南唐间的对峙攻伐和地区归属的不断变动，缺乏开展贸易活动的稳定环境，邻接两个区域的地缘优势无法发挥，甚至屡遭战火破坏，如南吴多次进攻岳州，^⑩五代后期南汉趁楚内乱夺取郴州。^⑪ 这些都对其商业发展形成阻碍。

五代荆湖地区商业的大幅进步主要得益于在分裂割据的政治格局下，中原对其的茶叶需求和湘江成为南北往来主要内陆通道带来的商品流通量增加，区域内部商业城镇的发育情况也取决于此。

① 《资治通鉴》卷 287，天福十二年八月，第 9375 页；《资治通鉴》卷 288，乾祐元年（948）六月，第 9394 页。

② 如荆南在后唐时“进银及茶……希宣赐战马以助军容”（《册府元龟》卷 168《帝王部·却贡献》，第 2029 页），以及“遣使人贡于契丹，契丹遣使以马赐之”（《资治通鉴》卷 286，天福十二年正月，第 9337 页）等。

③ 曾国富：《五代南平史三题》，《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④ 《新五代史》卷 69《南平世家第九·高季兴》，第 974 页。

⑤ 《资治通鉴》卷 287，天福十二年八月，第 9375—9376 页。

⑥ 《资治通鉴》卷 289，乾祐三年六月，第 9425 页。

⑦ “汉末遣三司将军路昌祚于湖南省茶，属淮南将边镐陷长沙，昌祚被贼送金陵。”《旧五代史》卷 112《周书三·太祖纪第三》，第 1724 页。后汉派往楚买茶的路昌祚恰在此时被边镐送往金陵，说明路昌祚买茶的地点应在长沙。

⑧ 《旧五代史》卷 119《周书十·世宗纪第六》，第 1838 页。

⑨ 曾育荣、黄柏权：《朗州蛮与唐末五代长江中游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雷氏父子为中心的考察》，《思想战线》2020 年第 4 期。

⑩ “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璋等将水军袭楚岳州。”《资治通鉴》卷 268，乾化二年（912）十一月，第 8764 页。“吴右雄武军使苗璘、静江统军王彦章将水军万人攻楚岳州。”《资治通鉴》卷 276，天成三年（928）四月，第 9017 页。

⑪ “南汉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御、将军谢贯将兵攻郴州……遂取郴州。”《资治通鉴》卷 290，广顺元年（951）十二月，第 9471 页。

商业进步主要集中在作为政治中心的长沙和江陵二城,完成了区域市场发展“从点到面”的第一步,但区域内其他城镇进展有限,折射出区域商业进步的局限。其本质上仍属政治产物,是统治者最大化利用本地条件攫取财富、巩固割据的权宜之计,而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

二、北宋商业城镇的整体性发展与空间格局

长江以南地区在北宋统一后,获得了更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经济继续保持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供应北边军事和京畿的压力下,政府加大了对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力度。国家财政对南方依赖度的提高和政府物资调配的商业化转向^①使区域间经济往来更加频繁。在此背景下,荆湖地区的农业开发和跨区域贸易得到进一步推动,商业城镇有了更全面普遍的发展。

北宋荆湖地区大致以洞庭湖和沅水为界,在五代州县的基础上被调整划分为荆湖南、北两路,原属江西的鄂州、京西的安州和五代属于南楚的岳、朗(北宋更名为鼎州)、澧、辰几州划入荆湖北路,地区内部经济上的“肥瘦搭配”更加平衡。为充分开发种稻条件优良却地旷人稀的洞庭湖平原及山区矿产资源,政府一面招揽流民前往矿区,如潭州永兴场“采银铜矿所集坑丁,皆四方浮浪之民”,^②一面增修水利设施以改善灌溉条件、减少水患。^③良好的耕种条件吸引江西袁、吉等州的农民纷纷自发迁入。^④移民和人口自然增殖的双重作用使北宋前中期荆湖人口增速居全国之首。同期全国其他地区户数超过20万的府州仅吉州(27万)、洪州(26万)、开封府(24万)、京兆府(22万)、福州(21万)、杭州(20万)、泉州(20万)八个,而潭州户数已高达35万户,衡州和江陵府近20万户,鄂、岳、邵州也在10万户上下(详见表1)。^⑤人口增长通常与地方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相关。大量人口提供的充足劳动力解决了曾经制约荆湖开发的主要障碍,耕垦范围从东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区拓展到西南部邵、永、全州。原为溪峒地区的沅州在初设时期,因“官田并山畚、园宅等荒闲甚多”而有“全、永、道、邵州人户往请射”,^⑥元丰年间“徽、诚蛮多典卖田与外来户”,^⑦从侧面说明当时全、邵等州相对肥沃的土地已基本得到开垦。整个地区农业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所扩展,形成以水稻为主,麦、粟等多种作物并举的种植结构,粮食和代表性经济作物茶叶的产量提升至新高度。^⑧

表 1 北宋中后期荆湖两路各府州户数和产茶额及熙宁十年商税额与税务数

	州	潭州	衡州	郴州	邵州	永州	全州	桂阳监	道州		
荆湖南路	元丰户数(户)	357824	180050	36988	97234	87201	34385	40848	36684		
	产茶额(斤)	1025350	5450	1994	16074 ¹	20311	4400	1125			
	商税额(贯)	93912	26383	18795	13014	10054	4063	5811	6315		
	税务数(个)	11	6	8	3	3	1	11	1		

① 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李焘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93,元丰元年(1078)十月己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153页。

③ 荆门军利用蒙、惠二泉“为三沼,延其流至竹陂河入汉江,民引以灌田”。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荆州府》,嘉靖元年(1522)刻本;监利县在经常遭受长江和汉水水患的地区“得当水冲者十余处,益工高厚筑之”,使其“不复决,役民大省”。刘放著,谿铭昕点校:《彭城集》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齐鲁书社2018年版,第979页。

④ 薛政超:《唐宋湖南移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81页。

⑤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35、508—511、528—531页。

⑥ 《长编》卷274,熙宁九年(1076)四月庚寅,第6704页。

⑦ 《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己酉,第8284页。

⑧ 周方高、宋惠聪:《宋代湖南的粮食种植结构初探》,《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周方高、彭露:《宋代湖南地区的茶业经济研究》,《中国农史》2016年第4期。

续表 1

荆湖北路	州	江陵府	鄂州	岳州	鼎州	澧州	峡州	归州	安州	辰州	沅州
	元丰户数(户)	189922	125257	96684	41160	58679	45496	9638	60744	8913	21040 ²
	产茶额(斤)	2500	177240	500960	129900	11500	19580	35300			
	商税额(贯)	50235	35354	41770	8777	16209	9630	5894	7360	2617	368
	税务数(个)	22	8	8	4	4	6	2	5	1	7

资料来源:户数根据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129—130页)整理,产茶额和熙宁十年商税额及税务数量根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4、食货16之12—15(刘琳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638、6330—6333页)整理。

说明:为与熙宁十年商税额形成对照,本表户数取元丰元年数据。《宋会要辑稿》中产茶额有两套数据,分别出自《乾道会要》和《中兴会要》,此处取记录北宋后期事的《乾道会要》,斤以下尾数四舍五入。熙宁十年商税额由各府州下辖税务税额加总而得,贯以下尾数四舍五入。

注:1.《宋会要辑稿》中邵州产茶额为6251斤,武冈军产茶额为9823斤。武冈军系崇宁五年(1106)由邵州析出。为便于和后面商税额数据进行参照对比,此处将武冈军产茶额并入邵州。

2.《中国人口史》中沅州户数为10565户,诚州(靖州)户数为10475户。诚州系神宗年间收复溪洞置,一度归属沅州。为便于和后面商税额数据进行参照对比,此处将诚州户数并入沅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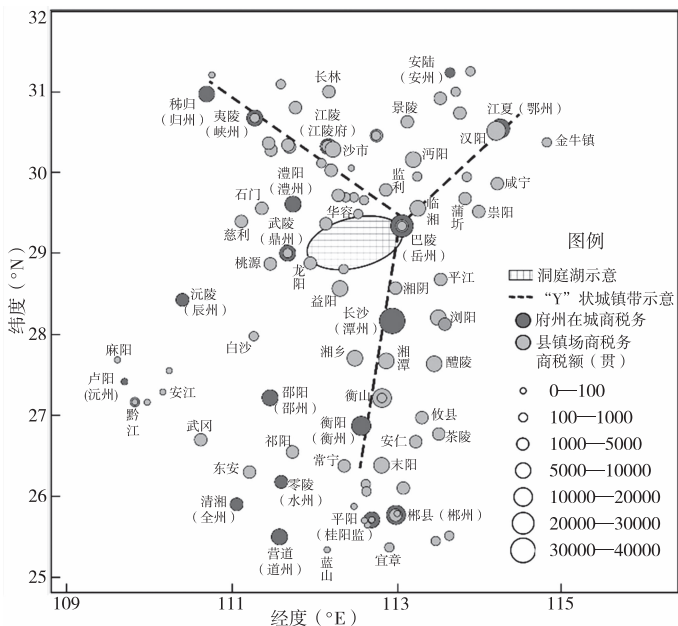


图 1 荆湖南、北路熙宁十年各税务商税额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图27—28);Berman, Lex, "V6 Time Series County Points," <https://doi.org/10.7910/DVN/Q9VOF5> 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0日;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12—15(第6330—6333页)相关内容整理。

说明:底图中的税场大致位置通过资料来源中相关地图和数据,以及《元丰九域志》《宋史》等文献检索分析获得。少量无法确定位置但可确定所属县的税务,鉴于县域有限,暂将其绘于县治附近,以示基本分布情况。峡州安香镇和古驿铺无法确定位置和属县,但其商税额平均只有7贯,总和不及峡州总额的2%,对本文分析几乎没有影响,故图中未包含这两个税场。本图仅显示各务商税额所在等级范围,其具体税额可参见《宋会要辑稿》。

荆湖地区的茶叶继续保持五代传统,销往北方。因被划为淮盐区,荆湖的粮食开始大量运至长江下游以交换食盐。^① 贸易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为地区商业城镇整体发育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为从商业活动中取得财政收入,政府在各州县治所城市和部分镇、关设务征收商税。收税是设

① “江南、荆湖岁漕米至淮南,受盐以归。”《宋史》卷182《食货下四》,第4438页。

置税场的主要目的,税额与当地交易额和过路商货总价值成正比,商业越发达的地方通常税务数量越多,税额也越高。因此,商税务的设立及其税额的空间分布情况,基本可以反映各城市县镇的商品流通量、商业繁荣度以及区域商业城镇网络。根据熙宁十年荆湖两路各务商税额及其空间分布(见图1)。位于湘江和长江沿岸的谭、衡、郴、岳、鄂五州的州城和衡山、汉阳两县的县城,商税额均超过1万贯。在全国以铜钱征税且熙宁十年设立税额的1823个税务中,^①税额超过1万贯的仅145处,潭州城商税额更是排在第22位,超过全国绝大多数城镇,可见其贸易量和商品流通量之大。荆湖两路西部为武陵山区、东界罗霄山脉,南接五岭,而商税务几乎都分布在东北部的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以及河流沿线平原地带,税务和商税额分布整体上东、北多,西、南少,平原多而山地少,沿长江和湘江大体呈“Y”状分布,表明长江和湘江及其主要支流沿岸平原地带城镇的贸易活动量更大,商业发展水平更高,荆湖内部商业城镇格局主要以长江和湘江为轴展开。

长江是荆湖地区东西方向上最重要的运线,是其与江淮和中原物资往来的通道,沿线征收商税的城镇较多且比较均匀地排布在长江沿岸,商税务和商税额的空间分布都相对均衡(见图1)。这种特征与该地带商业动力和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尽管北宋时农业开发程度加深,岳、鄂两州也有一定的产茶量,但由于江汉平原当时尚未完全形成,许多地区是难以利用的沼泽湿地,近河临湖的县镇在雨季水涨时节水患频仍,农业受到制约,如鄂州的嘉鱼、蒲圻等地“背江面湖,每岁桃花水生,环邑之境汇为巨泽,亘数百里,三邑之民不可以稼”。^②因此,当地农产品的外销量相对有限,商业发展依然主要得益于长江带来的交通优势。

结合商税额和物资跨区域运输线路,江陵、巴陵、江夏和汉阳应是荆湖长江沿岸地带商业中心城镇。北宋时期,江陵是西南地区与中原和长江下游流域人员和货物往来最主要的集散中心,“凡浮江下于黔、蜀,与夫陆驿自二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③川峡供给京师或北方军队的金帛布匹,广南从陆路北上的纲运物资均在江陵中转北上。^④为方便西南地区的商旅由此北上,朝廷还“开荆南城东漕河,至师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⑤免去其绕至鄂州汉阳的路程。江陵城作为重要交通枢纽兼政治中心城市,商税额却不到1万贯(即8469贯),这种反常情况与该府商税额最高的沙市(9801贯)有关。沙市距江陵城“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为舟车之会”,^⑥是城外码头市场。城市空间有限,容纳不下的人员货物均在此安置。荆湖北路转运司曾因川峡布纲数量过大,入城不便,而建议在沙市建布库存纳。^⑦可以说,沙市分担了江陵城的部分商业和漕运枢纽功能,沿江而来的货船在沙市停靠、装卸、交易比进城更方便,故其商税额高于江陵城也就不难理解了。五代因位于割据区边界而发展受限的岳州和鄂州在北宋重获生机。岳州城巴陵在洞庭湖连通长江处,“自湖南至于鼎、澧,苟非歉岁,则商贾兴贩,舳舻如云,水溢则必由华容,水落则必出巴陵。”^⑧这段文字虽然记于南宋前期,但“苟非歉岁”显示这种贸易活动已持续数年,两宋这一地区的

①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15—17(第6293—6349页)统计。为便于比较,此处在进行商税务数量统计时做了如下处理:未包含以铁钱计税的川峡四路;以铜钱计税的地区中,未设商税额的少数税务不纳入统计;一些税务因为税额较少而合并设立一个商税额,将此类合并设立税额的商税务计数为1。最终商税务数量统计结果为1823个。

② 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32《西和州陈史君墓志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102页。

③ 刘挚著,裴汝诚、陈晓平点校:《忠肃集》卷10《荆南府图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2页。

④ 《宋史》卷175《食货上三》(第4252页)载:“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棧置,分犂负担至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8之13(第7081页)亦载:“川峡布纲供京西诸军度用者,由荆南、襄州列递转送”,“广南诸州自桂州由湖南、北、江陵、荆门而至”。

⑤ 《宋史》卷94《河渠四》,第2345页。

⑥ 《宋史》卷452《忠义七》,第13309页。

⑦ “荆南府准省牒……为搬运布帛入城遥远,擎画于沙岸堤内起盖布库……每益州布纲到岸,只就江岸点检,对交与上京省员。如未有纲次,般赴沙市布库送纳。”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7—18,第6955—6956页。

⑧ 王炎:《上章岳州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6097,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册第86页。

水运和农业生产条件并无大变动,因此,该类活动应当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也存在,而巴陵为其枢纽。鄂州城江夏和汉阳县分列长江与汉江交汇处两岸,在开荆南城东漕河之前,途经江陵而需取道汉江者需先至鄂州。事实上,无论漕河开通与否,川蜀、荆湖乃至京西地区与江淮的人员物资往来都主要利用长江水路,鄂州是必经之路。北宋政府曾在全国设立六个“掌受诸州军买纳茶,以给商人”的榷货务,汉阳和江陵均在其列,^①这既强化了两地商品流通的功能,也佐证了其在跨区域贸易中的重要区位。

相比于荆湖其他区域,长江两岸府州设置商税务的市镇数量明显较多且不乏税额较高者,这是该地带商业发展的交通导向以及密布的河网导致几个集散中心外的商业活动整体较为分散的结果。将最典型的江陵府和荆湖南路同行政级别的潭州作一比较,其辖县数量、面积、人口和商税额总量均不及潭州,^②但商税务数量却高达22个,是潭州的2倍。交通导向下,许多位于次级水路枢纽、交通便捷的市镇逐渐成为商品流通的小中心,甚至超过州县治所城市,沙市就是此类典型。这也使得江陵城商税额虽然不及巴陵、江夏和汉阳,但江陵府商税总额仍高于岳州和鄂州。荆湖北路东北角的安州是州城商业不及县镇的典型。安州虽有河道与汉水和长江相通,但“植货不饶,惟俗善儒学”,^③商业并不活跃。熙宁十年州总商税额仅7360贯,其北部的州城(209贯)只占2.84%,远不及最南部汉水沿岸的景陵县(4749贯),也不如州城以南的应城县(1466贯)和云梦镇(740贯)。可见,交通条件在长江沿岸地带商业城镇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河网格局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地区商业城镇的空间格局。

湘江作为南北通道的重要性在北宋因赣江运输的恢复^④而有所减弱,但仍然是荆湖地区南北方向上最重要的运道,沿线各州中,商税额较高的长沙、湘潭、衡山、衡阳、郴县等均是位于主河道沿岸的州县治城。其中,以“据南北之冲,商旅舟车之所会”^⑤的潭州长沙为这一地带商品集散和长途贸易的中心。潭州是湘江流域的主要农业生产地,北宋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府的着力开发提高了其农产品的产量,而茶叶品质和产量都有大幅提升。宋真宗时岳麓茶曾被作为国礼赠与辽国。^⑥据张洎计算,湖南山茶每斤净利润可达640文,“淮南、两浙、江南等道茶货……所收净榷茶货利大约不逾于此。”^⑦北宋后期,潭州每年产茶额逾100万斤,超过荆湖两路其余府州产茶额之和(即92万斤,见表1)。长沙在五代即为湖南茶叶贸易中心,在北宋继续承担这一功能,还成为了荆湖南路粮食外销和食盐内销的中心。潭、衡、郴、永等州的谷米从农田流向本地县、州城,经湘江汇集于长沙,再销往长江下游,“巨舰漕米,一载万石”,时称长沙三绝之一。^⑧“万石”或有夸张的成分,但可证明当时长沙粮食运量巨大。荆湖两路属于淮盐区,航船通常从荆湖运粮至真、扬卸货,装载淮盐返回。交通干线上的城镇是食盐分销过程中的必经之处,区域商业中心城镇是食盐分销的重要节点。在荆湖地区,潭州、长沙是荆湖南路的食盐分销枢纽,衡、郴等州位于湘江沿线上的州城和县城为次级分销地,^⑨其商业活动体量之大在商税额上也得到印证:熙宁十年潭州9.4万贯的商税额已超过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除杭州以外的所有府州,仅长沙城的商税额就有3.4万贯,逼近同时期鄂州商税总额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7,第6640页。

② 参考本文表1和图1,另可参见王存著,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6《荆湖路》,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8—260、266—267页;《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93、2198—2199页。

③ 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77《荆湖北路·德安府》,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7页。

④ 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⑤ 郑侠:《怀集林府君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178,第100册第31页。

⑥ 《长编》卷61,景德二年十月丙戌,第1370页。

⑦ 张洎:《上太宗乞罢榷山行放法》,汝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108《财赋门·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2页。

⑧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62《风俗杂志·长沙三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23页。

⑨ 刘霄泉:《宋代盐业地理》,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第85—89、104—106页。

的3.5万贯；衡州城、郴州城和衡山县的商税额也都超过1万贯。

除州县治城，湘江流域其他的商税务均设置在矿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地粮食的充足供应促进了基于自然资源和物产条件的地域分工深化和非农业活动规模的扩大，桂阳监和郴、衡、潭等州不宜农耕但富含矿藏的地区可以通过向临近地区购买各类生活生产用品，将劳动力大量投入开采运输等活动。矿区非农业人口的日常供给无疑取自本地，其产品则销往外地，这促进了地区内部贸易，也使本地产品间接卷入跨区域市场流通中，如桂阳监平阳县的大湊山“出银矿，当其盛时……烹丁纷错，商旅往来辐凑”。^①在人口流动和商品交易量累积之下，部分矿场也发育出更多功能。从北宋仁宗中期到神宗中期，荆湖南路新增的25个商税务中有15个都在矿区，^②其中税额较高者，如潭州永兴银场（8952贯）和郴州浦溪银坑（3498贯），已超过部分县城。永兴银场在兴发两年后增设酒税务，^③酒的生产消费增长从侧面体现出这里人口消费和贸易活动的增长。大观年间，“潭州湘阴县、岳州平江县地界出产金宝去处甚多，只是百姓地主私召人淘采货卖”，^④表明该地区私人即可完成从人员组织、采矿到矿产销售的一系列人力和物资组织调配，反映出地区商业的活跃。

荆湖西南部资、沅、澧水流域基本只在位于主要河流沿岸的州县城设商税务，商税额不高且主要集中在州城，说明其贸易量和商业城镇发育较为有限。流域东北部澧、鼎、邵三州的地形以平原为主，是这一亚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区域，但其物产有相当数量用于供应当地驻军和西南山区，^⑤减少了可用于贸易的商品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商业活跃度。西南部的辰、沅、全、道、永几州多山地丘陵，贸易活动有限，如道州在湖南“最为小郡……舟车不至，商贾不通”，^⑥设立税务的城镇也较少。其贸易多是与山区进行，如“辰、沅、靖州多出板木，自来客人兴贩，与傜人交易”，后因争讼较多而被禁止，改为“委官措置收买，赴鼎州置场出卖”。^⑦熙宁七年沅州初设时，知州谢麟因本地屯田务没有军士应募而奏请发配罪人来此，以解决屯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⑧这也反映出当地各方面发展水平均较低，对外经济吸引力有限。沅州尽管设立了七个商税务，但总税额仅367贯，税务主要设立在控扼水路要道的城寨。情况与之相似且商税额更高的辰州只在州城设了一个税务。由此推断，沅州诸商税务应更多是出于协助管理新开边地、监督与西南边地及少数民族互市的考虑，而非单纯为了财政收入。

北宋荆湖地区的商业因全国各区域间的连通而益发繁荣，“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据九达之衢，舟车之会，四方百物，盖衔尾结辙而至，明玕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为不乏矣。有人于此，持千金之资，坐市区，售奇货，宜无不获也。”^⑨长沙和江陵这两个旧有商业中心达到新高度，巴陵、江夏和汉阳也成为长江中游的新兴商品流通枢纽。不过各府州商业城镇的发展并不均衡，发展动力也不同。长江沿岸因跨区域贸易和便利的水运条件，兴起了许多商业市镇，湘江流域商业城镇则更多是基于本

① 王象之编著：《舆地纪胜》卷61《荆湖南路·桂阳军》，第1617页。

② 《宋会要辑稿》中的商税额数据有“旧额”和熙宁十年两种，旧额数据只记场务名称和府州总商税额，其年代基本可以确定是仁宗中后期。参见郭正忠：《铁钱与北宋商税统计》，《学术研究》1985年第2期；林文勋：《北宋四川商税问题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魏嵩山：《北宋商、酒税旧额所属年代考》，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33页；李景寿：《北宋商税“旧额”时间再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104页。

③ 《长编》卷290，元丰元年七月丁酉，第7102页；《长编》卷298，元丰二年五月壬辰，第7251页。

④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15，第6741页。

⑤ 李纲在《乞将鼎州依虔州等处例带提举鼎澧等州兵马贼盗公事奏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707，第170册第84页）中提到，知鼎州程昌禹申：“本州赡养军兵几及万人，……本路并无漕臣应副。……辰、沅、靖州自来系鼎州应副……”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17页。

⑦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33，第6802—6803页。

⑧ 《长编》卷258，熙宁七年十二月乙酉，第6303页。

⑨ 杨时著，林海权整理：《杨时集》卷18《谢程漕》，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90页。

地物产和资源的开发与销售,西南部地区则进展十分有限。整体上,商业城镇分布重心指向东、北部沿河平原,与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人口数量和长江、湘江的分布大体一致,成带状格局。

三、南宋贸易方向的转变与商业市镇的进展

失去北方疆土,首都移至杭州后,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合于太湖平原,国内交通主轴线的东西转向日益明显。在经济、军事和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荆湖地区与北方的商业联系大为减弱,贸易活动主要呈东西向展开。一方面,荆湖与川蜀的联系更加密切。蜀地屡经兵火后,经济凋敝,需要荆湖支援,大量援助物资溯长江进入四川。^① 长江沿岸地带蜀人日益增多,如江陵“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鄂州“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②“蜀兵远送者,封桩裹粮之具,至此当尽数贸易,非三日不可了”。^③ 位于长江上中游过渡河段的归州新滩“两岸多居民,号滩子,专以盘滩为业”。^④ 大量以盘转船只越过险滩为生的人员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川蜀与长江中、下游往来船只数量规模的庞大。另一方面,荆湖向江南的粮食外销规模进一步扩大。经过百余年的开发,湖南已是“土地沃衍,最为出产谷米财物去处”,^⑤而江南大量人口的消费和当地农业种植结构的转型则使其逐渐成为粮食消费市场。潭、鼎、澧等州,“苟非歉岁,则商贾兴贩,舳舻如云,水溢则必由华容,水落则必出巴陵。”^⑥当地水运便捷,“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棗,以规厚利;父子相袭,老于风波,以为常俗。”^⑦不仅富商大贾,普通百姓也积极参与到这种跨区域粮食贩运中,世代沿袭形成贸易传统。大商贾和农业小生产者与大区域市场更密切、直接的联系也使荆湖地区与江南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地区商业更加繁荣。

由于荆湖地区受战争直接破坏较小,经长江和湘江展开的贸易活动方向也没有发生大变动,因此,其在南宋的农业生产、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商业空间格局基本承袭北宋。不过,国家政治和经济局势改变和区域持续开发仍对荆湖商业城镇空间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长江沿线商业中心的东移和交通便利地带商业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南宋时期,沙市虽然依旧是“大商辐凑”^⑧的商品流通枢纽,但鄂州作为“荆襄之肘腋,吴蜀之腰膂,淮南江西为其腹背,四通八达”,^⑨地势更显冲要,逐渐取代江陵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中心。鄂州农业与江汉平原的发育同步推进,南宋大量驻军又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消费市场,导致当地商业不单是过境贸易,更与其他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有机联系起来,本地商品生产和市场发展得到促进。鄂州城“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成为“虽钱塘、建康不能过”的都会。^⑩城外南市的繁荣同样引人注目,“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闹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⑪这些描绘透露出如下信息:第一,“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说明其商业联系范围已超越长江流域,几乎扩展

① 伍磊:《宋元之际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演变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

② 陆游:《入蜀记》卷5,陆游著,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钱锡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139页。

③ 范成大著,孔凡礼点校:《吴船录》卷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7页。

④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第222页。

⑤ 李纲:《具荆湖南北路已见利害奏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702,第170册第15页。

⑥ 王炎:《上章岳州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6097,第270册第86页。

⑦ 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1《奏劄·劄子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页。

⑧ 周必大著,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65《淮西帅高君夔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960页。

⑨ 罗愿:《鄂州小集》卷5《鄂州到任五事劄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

⑩ 陆游:《入蜀记》卷4,陆游著,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钱锡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7册,第118页。

⑪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第225—226页。

到南宋控制的全部疆域；第二，船舶不可胜计，货物不问多少都“一日可尽”，体现出其每日人员和商品流动量以及交易量的巨大；第三，酒肆楼栏的数量和规模庞大表明当地餐饮服务业发展程度较高，也映射出其商业的繁荣。可以说，鄂州城和城外南市共同构成了长江中游最大的商贸集散中心。

南市的兴盛折射出当时长江沿岸商业市镇的繁荣，除了规模较大的南市和沙市，其他一些中小市镇也有所发展，如鄂州金牛镇“民旅翕聚，亦千家市也”。^① 在洞庭湖以南地区，一些河流交汇或邻接不同城县、交通较为便利且人流量大的地方也逐渐形成新的商业市镇。比如，潭州桥口镇“当长沙、益阳、湘阴三县界首，商贾往来，多于此贸易”，因市成聚，庆元年间户数已超过两千。由于居住地不足，“于夹江地名暴家歧者，又为一聚落，亦数百家。”因位于县域边界，行政事权分散，政府监管力度弱，且“四通八达，水陆无迹”，违法者易于逃匿，故“常有劫盗入市，剽掠富家财物而去”。^② 有研究指出，由于该时期跨界地带行政控制力较弱而商业贸易自由度较高，具有跨境转运贸易的地缘优势，因此，随区域经济交流不断发展并逐渐摆脱行政区限制，跨界市镇也大量出现。^③ 荆湖地区因其市镇体系及监管机制尚不完备成熟，劫盗、走私、漏税等违法活动往往与活跃的商业共生，如地跨鄂州蒲圻与岳州临湘的新店、^④常德府武陵和龙阳两县靠近潭州产茶区的地带、^⑤武冈军新宁和永州东安等位于州军边界且与溪峒相通的地方^⑥等，皆属此类情况。不过绝大部分市镇规模有限，未能发育出南市、沙市这类成为区域贸易枢纽的市镇，其商业联系范围大多类似桥口镇，主要集中在周临地区。

西南部经济相对落后的辰、沅等州，在南宋时因交通格局转向和政府对于西南地区的管理逐渐稳定而经济进步较大，以沅水为核心的河谷平原和沅麻等几大盆地城市体系大体成形，交通便利的沿河地带商业城镇也有所发展，不过规模仍非常有限。^⑦ 南宋荆湖地区商业城镇格局大体承袭北宋。受国家交通轴线和经济格局转变的影响，贸易活动主要呈东西向开展，长江、汉水交汇处的鄂州城和南市取代江陵和沙市，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交换轴心。在商品流通地域范围和规模扩大的刺激下，不仅以南市和沙市为代表的附郭和交通枢纽市镇继续发展，交通便利而政府管控力较弱的行政区交界带也成为市镇的勃兴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地带。虽然缺乏南宋荆湖路所有市镇的详尽信息，但结合北宋商税务分布和南宋市镇发育的案例，有理由推测，至少在东北部长江—洞庭湖—湘江这一重心地带，已经形成具有一定层级和密度的商业城镇网络。

四、结语

通观五代与两宋，荆湖地区商业发展和商业城镇空间格局演变既有连贯性，又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就前者而言，其商业进程与国家政治局势、本地和外部区域的贸易情况联系在一起，长江和湘江始终是商业城镇的主轴，交通区位优势是长江沿线商业城镇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因素，而洞庭湖以南地区则比较依赖本地物产的外销。就后者而言，五代的割据格局以及楚和荆南对商业的依赖，为地区经济开发和商业进步提供了重要推力，其与北方的茶叶贸易带动了地区商业的繁荣。北宋荆湖在农业生产方面进步迅速而显著，在沿袭与北方贸易的同时，其与江淮地区形成了以粮食—食盐交换为主的商业联系。南宋荆湖与北方的贸易被中断，但与川蜀及江南的经济联系加深，跨区域贸易主要沿长江呈东西向展开。

五代两宋荆湖商业城镇的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是地区受政治、军事因素限制的同时，顺应并利

① 宝祐《寿昌乘》不分卷《镇》，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第36页。

②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140，第4398—4399页。

③ 王旭：《宋代跨界市镇——乌、青镇关系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4期。

④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80，第4365页。

⑤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30，第6694页。

⑥ 《宋史》卷494《蛮夷二》，第14193—14194页。

⑦ 张衢：《试论两宋时期湘西沅水流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求索》2006年第7期。

用当时经济格局和本地物产资源的结果。商业城镇的空间格局经历了从五代长沙、江陵两个主要政治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商业中心点状发育,到宋代商业城镇沿长江和湘江呈带状分布,再到商业市镇不断发育,使部分地区商业城镇网络逐渐密集起来的过程。其发展轨迹表明,对于荆湖这一无法直接开展跨区贸易并且在政治和经济上又不具有绝对重要地位的内陆区域而言,其商业繁荣很大程度依赖于政策导向,以及本地与商业发达地区贸易联系的紧密度。荆湖东部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始终高于西南部,商业城镇的空间分布同样东北密、西南疏。这既是洞庭湖平原农业生产的水热条件和交通便利度优于西南部山区的体现,也是这一时期国家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东部的江南,以及区域开发由近及远、从稳固统治区向边地深入的结果。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和普通民众贸易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将荆湖地区与更大范围的市场更紧密连接起来。长沙、江陵、沙市、江夏、南市等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和其他中小商业城镇的发育使区域商业城镇网络逐渐形成,纵深层级增加。几大商业枢纽城镇的繁荣显示出这一时期南方非江南核心区商业城镇所达到的高度,但它们与荆湖西、南部城镇间的巨大落差,也提示着荆湖区域市场尚未充分连成一体,仅是完成了地区商业城镇网络构建的初级阶段。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Cities and Towns in Jinghu Region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Song Dynasty

Yuan Yuying

Abstract: Commerce, as well as commercial cities and town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Jinghu region, which mainly consisted of the Dongting Lake Basin and the Jiangnan Plain,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Xiang River became major inland traffic line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due to separateness of different regions caused by political factors, which provided impetus and opportunity for commerce in Jinghu region. With the tea trad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Jinghu region, location advantage, as well as local mercantilism policies, Changsha City and Jiangling City grew into regional commercial center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is region soared in the Song Dynasty. Different areas were able to make the most of their natural endowments as regional exploitation went further. The Jinghu region successively built up trade ties with the north,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the Chuanshu region. Trans-regional trade direction turned from north-east to west-east after the Song Dynasty lost its northern territory. Changsha City maintained its role as commercial center in the Xiang River Basin during this period while the capital of prefecture Ezhou replaced Jiangling City, taking the role of the largest commercial center in the middle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Southern Song. While commercial cities and towns continuously sprang up, their spatial pattern evolved gradually from scattered points to a hierarchical network which radiated out from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Xiang River. This process of evolution demonstrate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national politics, economic trend and regional commerce in different backdrops.

Keywords: Five Dynasties, Song Dynasty, Jinghu Region, Commercial City and Town, Spati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丰若非)